

专业化与“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刘泽岩,林汉川,黄冠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专业化和国际化是“隐形冠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隐形冠军”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隐形冠军”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由制度基础观出发,分别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提高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有助于提升其出口绩效;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同会发生变化,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提升“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东部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降低“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小,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隐形冠军;专业化战略;出口绩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11—0071—13

一、引言

坚定不移的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的现实选择。在当前世界贸易摩擦导致市场环境的波动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亟需发展一批世界级的“隐形冠军”企业来保持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转型升级。这些在细分市场上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却鲜为人知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是我国提升全球产业链竞争力,打造产业链高级化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许惠龙和康荣平,200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隐形冠军”企业的研究主要围绕“隐形冠军”企业的特点和成功因素(蓝海林,2008;汪洋和许宏杰,2014)、经营战略(朱巍等,2019;杨震宁等,2014)、对中小企业的启示(江书陆,2005;黄利潮和张毕西,2007)等方面展开。而针对“隐形冠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专业化和全球化,鲜有文献进行研究。如何促进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是企业 and 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隐形冠军”企业通过聚焦形成有深度的专注成就了其市场领导地位(赫尔曼·西蒙,2017)。通过提高“隐形冠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可以提升企业的加工深度和研发深度,进而提升产品的独特性,从而有利于其全球化发展。因此,本文试图从专业化战略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提升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

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制度环境因素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其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关键的调节作用。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的控制“隐形冠军”企业研发创新的外部性,阻止外部其他企业通过技术溢出进行的模仿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Zhao,2006),这有助于激发“隐形冠军”企业集中资源提升研发深度,提升产品独特性,帮助其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但是对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隐形冠军”企业来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既保障了技术垄断的高收益,又保证了获取超额盈利的持续性。在此情况下,“隐形冠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获取更高质量创新成果的边际成本高于维持当前垄断收益的成本,于是丧失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结构和政策实施环境还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果可能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陈战光等,2020)。此时,过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隐形冠军”企

收稿日期:2020—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加强中国中小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模式与路径研究”(18ZDA05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战略及其竞争优势研究”(71332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时代增强中小企业数字能力的模式与推进机制研究”(19YJC630217)

作者简介:刘泽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与创新;林汉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黄冠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

业创新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隐形冠军”企业产品独特性会逐渐丧失,慢慢失去其在国际市场的发展优势。其次,对“隐形冠军”企业而言,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其因市场单一而承担的经营风险也在增加,这不利于“隐形冠军”企业通过资源聚焦战略来形成独特的产品竞争优势,进而制约其国际市场的发展(张梦丹和魏景赋,2017)。

基于以上情境,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隐形冠军”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专业化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并具体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制度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采用资源依赖理论系统解释了“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出口绩效的关键作用,为“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发展战略和国际化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基于制度基础观,从政府行政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出发,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其出口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和拓展了“隐形冠军”企业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相关研究。最后,通过探讨不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制度环境因素调节作用的差异性,为“隐形冠军”企业制定具体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决策,以及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并对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基准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并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专业化经营与“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于它所依赖的外部进行互动和交换,以此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需求(Pfeffer和Salancik,1978)。“隐形冠军”企业扎根于利基市场,通过实施专业化战略获取了较高的专用性资源(李庆华和李春生,2008)。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资源积累程度和资源的性质是决定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因素(谢军和徐青,2009)。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益,既要有丰富的资源,更要有与国际市场机会相匹配的资源(Collis,1991;Fahy,2002)。因此,那些拥有较高专用性资源的“隐形冠军”企业将更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利。具体而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产品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获取利润,必须投入相应的资源。市场竞争越激烈,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而“隐形冠军”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其一定时间内能够投入的资源通常是有限的。所以,“隐形冠军”企业会选择专业化经营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产品的深度研发和深度加工,实现了企业深度价值创造。在一个领域内深入而持久的研究能够使得企业在该领域内储备相当强的能力,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独特性非常强,且在同领域内没有其他产品能够替代,这可以帮助“隐形冠军”企业产品更快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获取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相反,“隐形冠军”企业一旦选择了多元化经营之路,就需要对所经营的每一个产品投入相应的资源。其多元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造成管理者难以关注核心业务,各部门协调困难,资源投入不合理,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代理成本上升等问题,同时资源的分散也会带来企业对市场了解不足,顾客服务质量下降,难以建立和维持与上下游企业或顾客的良好关系,以及难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等问题,进而不利于“隐形冠军”企业的海外出口。

其次,专业化经营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Kunst和Martin,1989)。而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出口绩效是密切相关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于“隐形冠军”企业来说,多元化经营往往会产生一种“玩具效应”,即管理层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产品,其代价就是对现有产品的关注减少,导致现有产品的生产率优势会降低(Schoar,2002)。相反,专业化经营有助于“隐形冠军”企业利用分散的资金增加技术投资,技术的提升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有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够国际市场中有利可图。

同时“对利基市场的依赖性也导致了隐形冠军”企业在国内无法实现规模效应,为此,“隐形冠军”企业必须深入到广阔的国际市场,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赫尔曼·西蒙,2019)。利基市场是在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当“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内利基市场过小的市场容量会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从而使客户认可度或价格竞争力丧失。此时,“隐形冠军”企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

由此提出假设1:“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正相关,即“隐形冠军”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出口绩效水平越高。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制度基础观是企业战略研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Peng, 2002; North, 1991)。该理论着眼于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动态互动,并将企业战略视为这种互动的结果。具体而言,企业的战略选择不仅受到行业条件和企业能力的驱动,而且也反映了管理者在特定制度框架下面临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在对制度的分析中,制度基础观整合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观点(Scott, 1995; Peng et al, 2008),指出行业竞争、技术变化、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文化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与此同时,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约束与企业内部资源及能力交互作用,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Meyer和Peng, 2015)。

任意东道国或母国都独自具备一系列制度因素的集合。这些制度因素对于企业海外扩张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Gokalp et al, 2017)。因此,本文以制度基础观为理论基础,讨论母国制度环境对“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认为母国制度环境通过影响“隐形冠军”企业家的风险感知,以调节专业化经营与“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

制度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多个层面多种制度相互依存而共同构成了整体的制度环境(周建等, 2010)。依据“隐形冠军”企业的特征,结合制度变迁的速度和作用层次,本文将制度环境主要划分为经济制度环境、政府行政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Williamson, 2000)。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是“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我国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政策的频繁变化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行政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保持政策的稳定性,给企业提高一个安定的外部发展环境。政策的稳定不但可以减少企业的寻租活动(李雪灵等, 2012; 刘伟等, 2014),还有利于企业创新行为的改善(廖开容和陈爽英, 2011)。法律保护制度主要是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企业创新速度和创新质量,促进“隐形冠军”企业不断成长和发展(邵传林和邵姝静, 2016)。

考虑到现有的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主要都是从经济制度环境出发展开研究,基于政府行政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的研究较少(任颀等, 2015; 赵军等, 2020)。同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发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越加突出和重要(李政等, 2021; 黄先海和卿陶, 2020)。本文主要从政府行政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出发,选择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来探究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专业化经营在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中的所发挥的作用。

1.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在中国转型经济时期,地区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差异是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帮助“隐形冠军”企业克服外部性问题,增强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易靖韬和蔡菲莹, 2019)。对“隐形冠军”企业来说,持续的创新是保证其出口绩效的重要因素。采用专业化经营战略的“隐形冠军”企业能够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从而在各自领域达到非常高的研发深度和价值创造深度,使企业产品和服务获得远高于相关领域内其他公司的创新水平,形成自己的特色化优势。这种特色化优势帮助“隐形冠军”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中快速建立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绩效。因此,当“隐形冠军”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低时,“隐形冠军”企业的创新活动获得的知识产权会存在较强的外部性,即“隐形冠军”企业很难阻止外部其他企业通过技术溢出进行的模仿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陈战光等, 2020)。这会增大“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的风险,进而弱化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的控制“隐形冠军”企业创新的外部性,有效激励专业化程度高的“隐形冠军”开展持续创新,进而提高出口绩效。但当“隐形冠军”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高时,又会反过来抑制其持续创新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对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隐形冠军”企业来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既保障了技术垄断的高收益,又保证了获取超额盈利的持续性。此时,对于专业化程度高的“隐形冠军”企业来说,进行研发投入获取更高质量创新成果的边际成本高于维持当前垄断收益的成本,于是丧失持续创新的积极性,出口绩效下降。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a: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得“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关系加强。

假设 2b: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得“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关系减弱。

2.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随时间而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又一个重要来源。不同时期,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政府政策在未来方向、执行强度和效果等方面存在多重可能(Baker et al, 2016),构成了企业决策所面临的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转型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频繁运用各项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增加了国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摩擦不断和疫情的持续蔓延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和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隐形冠军”企业而言,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其因市场单一而承担的经营风险也在增加,从而专业化经营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具体而言,“隐形冠军”企业通常扎根于利基市场(李庆华和李春生, 2008),选择专业化经营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点,迅速成为该市场的领导者。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在保证“隐形冠军”企业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加大了其对单一市场或产品的依赖性,使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风险的能力降低。在此情况下,一旦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提高,“隐形冠军”企业出于降低其经营风险的目的,其风险规避倾向可能更加明显,更不愿意实施风险性的国际化战略。同时“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致的外部风险感知会更加敏感,进而更加倾向于采用保守性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专业化程度高的“隐形冠军”企业为了降低其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增加出口的稳定性,可能会减少出口规模来转嫁或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冲击。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3: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关系会减弱。

3. 地域异质性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受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等影响(戴其文等, 2015),不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相应的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关系的调节也会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优先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与公共资源倾斜及地理邻近性的比较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东部地区的“隐形冠军”企业不但具有更高的专业化程度,也面临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此时,在高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具有更高的专业化程度的东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维持当前的技术垄断收益而不断的降低创新投入,进而影响出口绩效。同时高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隐形冠军”企业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加剧,出口稳定性降低,相应的出口绩效也会减少。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对“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的影响也较小。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4a: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负向调节“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 4b:在中西部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正向调节“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

假设 4c:不同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果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依据国家工信部、工业联合会、《投资者报》和高校等机构提供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和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名单,合并整理并从中选出在沪深上市的企业,从而保证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数据,为实证研究提供较好的基础。本文选择立足于中国本土并已取得成功的“隐形冠军”企业样本,研究期间为 2010—2018 年,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剔除经过特殊处理(special treatment)的公司和上市不满 5 年的公司数据后,最终得到 173 家“隐形冠军”企业 9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总数为 1172 个。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Ex_s)。国际化发展是“隐形冠军”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邵丽丽和孙铮(2017)、张天顶和吕金秋(2018)的研究,采用企业海外收入比重衡量“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定义为“隐形冠军”企业海外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解释变量：“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Divhhi$)。高度专业化是“隐形冠军”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聚焦利基市场使得“隐形冠军”企业在该领域储备远超于其竞争对手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帮助“隐形冠军”企业在国际市场快速建立竞争优势。因此,专业化程度是“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杨兴全等(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赫芬德尔指数衡量“隐形冠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Divhhi = \sum_{i=1}^n w_i^2 \quad (1)$$

其中: w_i 表示“隐形冠军”企业第*i*类主营业务收入占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值越大。

调节变量: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由 Baker et al(2016)构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和应用,该指数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发布,可以公开获取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多国各年月度的指数。本文采用中国各年月度数据简单计算平均值得到该变量值;②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PR)。根据李莉等(2014)的研究,本文采用技术转让市场规模来衡量,即各省当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两者的比值越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各省当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和生产总值分别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同时,本文还采用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密度和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知识产权代理密度为各省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数目与技术人员的比值(吴超鹏, 2009),各省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数目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代理年检公告和专利代理年度报告,各省技术人员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采用各省专利行政执法的累计结案率来衡量(Kafouros et al, 2015),立案与结案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并用各省技术市场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加权计算获得。

控制变量(X):根据以往的文献(周黎安和罗凯, 2005; Hirshleifer et al, 2012),并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企业绩效(Roa)、成长性($Gsales$)、企业年限(Age)、政府补贴($Subsidies$)、金融支持($Loan$)、行业集中度(HHI)、独立董事比例($Indrat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on)、资本密集度(Cc)。除此之外,在模型中还设置了产权性质($OwnshipD$)、行业($IndustryD$)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D$),具体见表1。此外,为控制潜在的截面相关问题,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对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 cluster 调整以减少偏差。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Ex_s	出口绩效	企业海外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解释变量	$Divhhi$	赫芬德尔指数	$Divhhi = \sum_{i=1}^n p_i^2$
调节变量	EPU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中国各年月度数据简单算数平均取对数
	IPR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各省当年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erage$	资产负债率	企业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Roa	企业绩效	利润除以资产总额
	$Gsales$	成长性	企业销售收入的年增长率
	Age	企业年限	企业设立年限加1后取对数
	$Subsidies$	政府补贴	企业补贴额与销售额的比重
	$Loan$	金融支持	企业有利息支出取1,没有利息支出取0
	HHI	行业集中度	企业销售额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重的平方和
	$Indrate$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
	con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持股最多的股东的持股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数的比例
	Cc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加1取对数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本文设立如下模型:

$$Ex_{s_{it}} = \alpha + \beta_1 Divhhi_{it} + \beta_2 IPR_{it} + \beta_3 IPR_{it} \times Divhhi_{it} + \beta_4 EPU_{it} + \beta_5 EPU_{it} \times Divhhi_{it} + \beta_6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表示企业; t 表示时间; ε_{it} 为误差; β 为待估计的回归系数; $EPU_{it} \times Divhhi_{it}$ 和 $IPR_{it} \times Divhhi_{it}$ 为交互项; α 为常数项; X_{it}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Ex_{s} 是对“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衡量,其均值为 0.1956,表明平均上样本“隐形冠军”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19.56%。郝尔曼·西蒙对全球“隐形冠军”的研究发现,海外发展是“隐形冠军”企业的重要支柱,其业务比重常常达到一半以上。而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海外业务占比不到 1/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Divhhi$ 是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衡量,其均值为 0.8073,表明有我国“隐形冠军”企业整体上偏向于多元化经营。

表 2 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符号	N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Ex_s	1172	0.9909	0.0000	0.1956	0.1956	0.2226
$Divhhi$	1172	1.1144	0.0000	0.9332	0.8073	0.2327
EPU	1172	277.8131	92.1142	124.3355	141.9740	58.0046
IPR	1172	0.1602	0.0002	0.0064	0.0182	0.0361
$Size$	1172	25.1222	18.9644	21.5273	21.6308	0.9078
Age	1172	3.6376	1.7918	2.7726	2.7574	0.2897
$Loan$	1172	1.0000	0.0000	1.0000	0.9782	0.1462
HHI	1172	0.9279	0.0102	0.0339	0.0564	0.0653
$Subsidies$	1172	0.1777	-0.0283	0.0081	0.0131	0.0160
Roa	1172	0.3033	-1.4316	0.0488	0.0496	0.0851
$Leverage$	1172	4.5429	0.0080	0.3116	0.3352	0.2128
$Gsales$	1172	24.5409	-0.6570	0.6263	0.9088	1.4589
$Indrate$	1172	0.6250	0.2500	0.3333	0.3683	0.0475
con	1172	0.7044	0.0300	0.2737	0.3043	0.1375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使加入交互项前后解释变量的系数更具可比性,将回归模型中各交互项均作中心化处理。表 3 展示了计量模型(2)的逐步回归结果。表 3 第(1)列为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专业化程度($Divhhi$)的回归结果, $Divhhi$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隐形冠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与其出口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第(3)列的回归模型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各年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量(EPU)及与“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交互项($Divhhi \times EPU$),可以看到“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显著为正,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第(4)列和第(5)列的回归模型在第(2)列的基础上按照“隐形冠军”企业所在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和低是知识产权保护地区进行分组回归。第(4)列和第(5)列分别汇报了在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地区和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地区加入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变量(IPR)及与“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交互项($Divhhi \times IPR$)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高知识产权水平地区“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依旧显著为正,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得“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关系减弱。其他地区“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交互项都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使得“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关系加强。

表3 “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经营与出口绩效的回归结果

<i>Ex_s</i>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hhi</i>		0.0253*** (4.05)	0.0241*** (3.77)	0.0433*** (5.23)	0.2335*** (3.13)
<i>EPU</i>			-0.0070 (-0.36)		
<i>Divhhi</i> × <i>EPU</i>			-0.0152* (-1.80)		
<i>IPR</i>				-0.0418*** (-7.22)	0.2013 (1.16)
<i>Divhhi</i> × <i>IPR</i>				-0.0205*** (-4.42)	0.5404*** (2.91)
<i>Age</i>	0.0909*** (3.39)	0.0884*** (3.23)	0.0748*** (2.76)	0.1243*** (3.01)	0.0440 (1.20)
<i>Size</i>	-0.0011 (-0.11)	-0.0032 (-0.31)	-0.0011 (-0.12)	-0.0476*** (-3.63)	0.0308** (2.18)
<i>Loan</i>	0.0573 (0.95)	0.0630 (1.07)	-0.0003 (-0.01)	0.0588 (0.82)	0.0514 (0.58)
<i>HHI</i>	0.2691* (1.75)	0.1128 (0.71)	0.1216 (0.32)	0.5682** (2.45)	-0.1756 (-0.88)
<i>Subsidies</i>	-3.1655*** (-6.97)	-3.4150*** (-7.22)	-2.0910*** (-4.52)	-3.9331*** (-5.28)	-2.6038*** (-4.12)
<i>Roa</i>	-0.2087 (-1.26)	-0.2772* (-1.65)	-0.0570 (-0.35)	-0.4337* (-1.84)	-0.3169 (-1.43)
<i>Leverage</i>	-0.1044** (-2.19)	-0.0773 (-1.64)	-0.0064 (-0.14)	-0.0639 (-0.90)	-0.1629 (-2.66)
<i>Gsales</i>	-0.0172** (-2.22)	-0.0112 (-1.40)	-0.0130* (-1.85)	0.0106 (0.93)	-0.0202* (-1.94)
<i>Indrate</i>	-0.0322 (-0.26)	-0.0807 (-0.65)	-0.2221* (-1.70)	-0.0132 (-0.07)	-0.4370** (-2.52)
<i>con</i>	-0.0321 (-0.68)	-0.0446 (-0.94)	-0.0488 (-0.96)	-0.1280* (-1.91)	-0.0065 (-0.10)
<i>Cc</i>	-0.0121 (-1.37)	-0.0112 (-1.26)	-0.0152* (-1.78)	0.0142 (1.36)	-0.0546*** (-3.97)
<i>Constant</i>	0.1925 (0.82)	0.2578 (1.11)	0.2147 (0.89)	0.7361** (2.25)	0.4536 (1.50)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172	1172	1172	505	667
Adj- <i>R</i> ²	0.0599	0.0680	0.0661	0.1824	0.0955
<i>F</i>	6.327***	6.689***	6.054***	6.772***	4.679***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三)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企业层面的变量可能由于不可观测因素的存在或变量测量偏误而导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参照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采用滞后一期“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Divhhi*依旧显著为正,交互项*Divhhi* × *EPU*显著为负,在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交互项*Divhhi* × *IPR*显著为负,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地区,交互项*Divhhi* × *IPR*显著为正,说明表3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4 工具变量检验

<i>Ex_s</i>	(1)	(2)	(3)	(4)
	滞后一期	滞后一期	滞后一期	滞后一期
	全样本	全样本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hhi</i>	0.0283*** (3.66)	0.0280*** (3.36)	0.0482*** (4.83)	0.1636** (2.00)
<i>EPU</i>		0.0212* (1.76)		
<i>Divhhi</i> × <i>EPU</i>		-0.0032** (-1.99)		
<i>IPR</i>			-0.0497*** (-7.69)	-0.0098 (-0.11)
<i>Divhhi</i> × <i>IPR</i>			-0.0211*** (-4.48)	0.4121** (2.05)
<i>Age</i>	0.0822*** (2.77)	0.0821*** (2.77)	0.1296*** (2.81)	-0.0197 (-0.50)
<i>Size</i>	-0.0027 (-0.25)	-0.0027 (-0.25)	-0.0427*** (-3.18)	0.0281** (1.99)
<i>Loan</i>	0.1211 (0.69)	0.1214 (0.69)	0.1028 (1.29)	0.0177 (0.17)
<i>HHI</i>	-3.6852*** (-7.50)	-3.6861*** (-7.49)	0.3010 (1.22)	0.1476 (0.61)
<i>Subsidies</i>	-0.3374* (-1.95)	-0.3370* (-1.94)	-3.7843*** (-3.55)	-3.0015*** (-5.95)
<i>Roa</i>	-0.0938* (-1.88)	-0.0936* (-1.88)	-0.7883*** (-2.85)	-0.1886 (-0.98)
<i>Leverage</i>	-0.0065 (-0.79)	-0.0065 (-0.80)	-0.0769 (-1.05)	-0.2169*** (-3.40)
<i>Gsales</i>	-0.0958 (-0.74)	-0.0953 (-0.73)	0.0189 (1.54)	-0.0120 (-1.20)
<i>Indrate</i>	-0.0268 (-0.52)	-0.0268 (-0.52)	-0.1876 (-1.04)	-0.4283** (-2.01)
<i>con</i>	0.1211 (0.69)	0.1214 (0.69)	-0.0303 (-0.37)	-0.1216* (-1.78)
<i>Cc</i>	-0.0144 (-1.53)	-0.0144 (-1.53)	0.0081 (0.66)	-0.0537*** (-3.83)
<i>Constant</i>	0.2930 (1.16)	0.2681 (1.06)	0.8341** (2.44)	0.5685* (1.66)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续表

<i>Ex_s</i>	(1)	(2)	(3)	(4)
	滞后一期 全样本	滞后一期 全样本	滞后一期 高知识产权保护	滞后一期 低知识产权保护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i>N</i>	1028	1028	467	561
Adj- <i>R</i> ²	0.0689	0.0556	0.1766	0.1193
<i>F</i>	6.650	6.335	8.356	4.943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2. 核心变量测量

本文分别对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变量测量的稳健性检验。首先研究的是“隐形冠军”企业的出口绩效,除了用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还可以采用海外销售收入的对数(*Ex*)来衡量(张天顶和吕金秋,2018),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到采用新的变量测度方法后,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5 被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i>Ex</i>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hhi</i>		0.2152*** (4.20)	0.1447*** (3.80)	0.4025*** (5.99)	1.8105*** (2.90)
<i>EPU</i>			-0.0090 (-0.73)		
<i>Divhhi</i> × <i>EPU</i>			-0.0354** (-1.99)		
<i>IPR</i>				-0.3019*** (-3.20)	1.3639 (1.02)
<i>Divhhi</i> × <i>IPR</i>				-0.2603*** (-4.00)	4.3884*** (2.88)
<i>Age</i>	0.5874*** (3.47)	0.5964*** (3.46)	0.6200*** (3.32)	0.5071* (1.78)	0.5966*** (2.60)
<i>Size</i>	0.8206*** (11.16)	0.7836*** (10.76)	0.8147*** (10.50)	0.5651*** (4.73)	0.8744*** (9.70)
<i>Loan</i>	0.7858 (1.37)	0.8563 (1.54)	0.8288 (1.56)	0.6441 (1.01)	0.5687 (0.75)
<i>HHI</i>	1.0437 (0.90)	0.0792 (0.07)	0.3208 (0.15)	-0.1297 (-0.08)	0.0684 (0.04)
<i>Subsidies</i>	-28.3688*** (-8.26)	-31.1178*** (-8.66)	-25.7508*** (-7.17)	-35.0316*** (-5.44)	-30.0612*** (-6.38)
<i>Roa</i>	1.7172 (1.46)	1.0865 (0.93)	1.8553* (1.72)	-2.0414 (-1.18)	3.4907** (2.27)
<i>Leverage</i>	0.6995** (2.00)	0.8123** (2.34)	1.1438*** (3.32)	1.4728*** (2.91)	0.3839 (0.81)
<i>Gsales</i>	-0.1728** (-2.56)	-0.1147* (-1.66)	-0.0959 (-1.56)	-0.1870* (-1.82)	0.0300 (0.45)
<i>Intrate</i>	1.1803 (1.31)	0.7096 (0.79)	0.1886 (0.19)	0.6654 (0.57)	-1.4457 (-1.08)
<i>con</i>	-0.3918 (-1.04)	-0.4798 (-1.29)	-0.7284* (-1.73)	-1.6886*** (-2.82)	-0.2670 (-0.57)
<i>Cc</i>	-0.2981*** (-4.62)	-0.2816*** (-4.34)	-0.2667*** (-4.06)	-0.2129** (-2.46)	-0.3574*** (-3.97)
<i>Constant</i>	2.3605 (1.40)	3.1715* (1.92)	0.1586 (0.07)	7.8302*** (2.82)	3.5164* (1.71)
<i>OwnershipD</i>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172	1172	1172	505	667
Adj- <i>R</i> ²	0.2672	0.2767	0.2899	0.3648	0.3080
<i>F</i>	25.44	22.78	22.18	9.938	15.44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其次,采用收入熵(*Divei*)来衡量“隐形冠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杨兴全等,2019),计算方法如下:

$$Divei = \sum_{i=1}^n w_i \ln \left(\frac{1}{w_i} \right) \quad (3)$$

其中: w_i 表示“隐形冠军”企业第*i*类主营业务收入占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值越小,当企业专业化经营时*Divei* = 0,为了便于理解取相反数。回归结果见表6。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最后,采用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密度和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作为调节变量知识产权保护(*IPR*)的稳健性检验指标。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密度为各省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数目与技术人员的比值,回归结果见表7第(1)列和第(2)列。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采用各省技术市场规模占全国比重加权的专利行政执法累计结案率来衡量,回归结果见表7第(3)列和第(4)列。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6 解释变量稳健性检验

<i>Ex_s</i>	(1)	(2)	(3)	(4)	(5)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ei</i>		0.0279*** (4.87)	0.0259*** (4.17)	0.0429*** (5.57)	0.1538** (1.98)
<i>EPU</i>			-0.0076 (-0.40)		
<i>Divhhi</i> × <i>EPU</i>			-0.0193** (-2.37)		
<i>IPR</i>				-0.0420*** (-7.21)	0.2532 (1.43)
<i>Divhhi</i> × <i>IPR</i>				-0.0197*** (-4.32)	0.3293* (1.74)
<i>Age</i>	0.0909*** (3.39)	0.0902*** (3.30)	0.0763*** (2.82)	0.127*** (3.06)	0.0494 (1.36)
<i>Size</i>	-0.0011 (-0.11)	-0.0038 (-0.37)	-0.0016 (-0.17)	-0.0473*** (-3.62)	0.0303** (2.15)
<i>Loan</i>	0.0573 (0.95)	0.0647 (1.10)	0.0003 (0.00)	0.0623 (0.86)	0.0480 (0.54)
<i>HHI</i>	0.2691* (1.75)	0.1054 (0.67)	0.1350 (0.35)	0.5675** (2.47)	-0.1792 (-0.91)
<i>Subsidies</i>	-3.1655*** (-6.97)	-3.4361*** (-7.28)	-2.1183*** (-4.57)	-3.9940*** (-5.37)	-2.5399*** (-4.05)
<i>Roa</i>	-0.2087 (-1.26)	-0.2824* (-1.68)	-0.0678 (-0.42)	-0.4437* (-1.88)	-0.3137 (-1.40)
<i>Leverage</i>	-0.1044** (-2.19)	-0.0770 (-1.64)	-0.0053 (-0.12)	-0.0628 (-0.90)	-0.1588*** (-2.60)
<i>Gsales</i>	-0.0172** (-2.22)	-0.0113 (-1.42)	-0.0134* (-1.92)	0.0092 (0.80)	-0.0209** (-2.00)
<i>Indrate</i>	-0.0322 (-0.26)	-0.0858 (-0.70)	-0.2270* (-1.74)	-0.0111 (-0.06)	-0.4278** (-2.43)
<i>con</i>	-0.0321 (-0.68)	-0.0461 (-0.97)	-0.0473 (-0.94)	-0.1354** (-2.01)	-0.0074 (-0.11)
<i>Cc</i>	-0.0121 (-1.37)	-0.0102 (-1.14)	-0.0140 (-1.63)	0.0139 (1.33)	-0.0513*** (-3.66)
<i>Constant</i>	0.1925 (0.82)	0.2567 (1.11)	0.2010 (0.83)	0.7344** (2.25)	0.4270 (1.42)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172	1172	1172	505	667
Adj- <i>R</i> ²	0.0599	0.0703	0.0695	0.1820	0.0907
<i>F</i>	6.327	6.957	6.387	6.817	4.399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表7 知识产权保护调节变量检验

<i>Ex_s</i>	(1)	(2)	(3)	(4)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密度		执法力度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hhi</i>	0.0333*** (2.66)	0.0820*** (3.48)	0.0496*** (5.59)	0.0610** (2.18)
<i>IPR</i>	-0.0255*** (-3.75)	-0.0282 (-0.54)	-0.0520*** (-7.11)	-0.0976* (-1.67)
<i>Divhhi</i> × <i>IPR</i>	-0.0167*** (-2.73)	0.1041** (2.23)	-0.0149*** (-3.16)	0.1159** (1.97)
<i>Age</i>	0.0533 (1.07)	0.0775** (2.40)	0.1326*** (3.08)	-0.0074 (-0.20)
<i>Size</i>	-0.0224* (-1.75)	0.0058 (0.42)	-0.0468*** (-3.56)	0.0258* (1.91)
<i>Loan</i>	0.0358 (0.46)	0.0751 (0.92)	0.0944 (1.26)	0.0395 (0.39)
<i>HHI</i>	0.2788 (1.18)	-0.1917 (-0.96)	0.1863 (0.83)	0.2112 (1.00)
<i>Subsidies</i>	-2.2873*** (-3.06)	-3.7744*** (-6.51)	-3.8201*** (-3.82)	-2.5573*** (-5.30)
<i>Roa</i>	-0.2620 (-1.07)	-0.3506 (-1.63)	-0.8574*** (-3.26)	-0.1089 (-0.58)
<i>Leverage</i>	-0.0404 (-0.50)	-0.1286** (-2.24)	-0.0502 (-0.71)	-0.2007*** (-3.37)
<i>Gsales</i>	0.0041 (0.38)	-0.0073 (-0.71)	0.0219* (1.85)	-0.0232** (-2.36)
<i>Indrate</i>	-0.1894 (-1.00)	-0.1656 (-1.05)	-0.1662 (-0.94)	-0.2509 (-1.36)
<i>con</i>	-0.1849*** (-2.96)	-0.0047 (-0.08)	-0.0439 (-0.59)	-0.1002* (-1.66)
<i>Cc</i>	-0.0049 (-0.46)	-0.0241** (-2.00)	0.0066 (0.56)	-0.0498*** (-3.87)
<i>Constant</i>	0.6142* (1.84)	0.3478 (1.17)	0.9418*** (2.80)	0.3877 (1.19)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i>N</i>	505	667	529	643
Adj- <i>R</i> ²	0.1785	0.0771	0.1689	0.1114
<i>F</i>	5.523	5.386	7.944	6.128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3. 估计方法

表8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Divhhi*)依旧显著为正,在高知识产权水平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PR*)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低知识产权水平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PR*)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8 Tobit 估计方法稳健性检验

<i>Ex_s</i>	(1)	(2)	(3)	(4)
	全样本	全样本	高知识产权保护	低知识产权保护
<i>Divhhi</i>	0.0278*** (3.94)	0.0248*** (3.57)	0.0433*** (4.88)	0.2735*** (3.26)
<i>EPU</i>		-0.0112 (-0.56)		
<i>Divhhi</i> × <i>EPU</i>		-0.0167* (-1.90)		
<i>IPR</i>			-0.0575*** (-7.06)	0.1620 (0.85)
<i>Divhhi</i> × <i>IPR</i>			-0.0311*** (-4.60)	0.6249*** (3.02)
<i>Age</i>	0.0853*** (2.77)	0.0839*** (2.91)	0.1500*** (3.32)	0.0222 (0.55)
<i>Size</i>	0.0017 (0.15)	0.0044 (0.44)	-0.0447*** (-3.03)	0.0383** (2.49)
<i>Loan</i>	0.0903 (1.24)	0.0133 (0.20)	0.0588 (0.71)	0.0901 (0.79)
<i>HHI</i>	0.1393 (0.74)	0.1188 (0.28)	0.6849** (2.46)	-0.2156 (-0.96)
<i>Subsidies</i>	-3.9121*** (-6.72)	-2.3353*** (-4.28)	-4.7474*** (-5.12)	-2.8625*** (-3.77)
<i>Roa</i>	-0.3122* (-1.68)	-0.0662 (-0.38)	-0.3713 (-1.51)	-0.4387* (-1.79)
<i>Leverage</i>	-0.0501 (-0.95)	0.0191 (0.39)	-0.0577 (-0.74)	-0.1437** (-2.10)
<i>Gsales</i>	-0.0148 (-1.63)	-0.0170** (-2.17)	0.0091 (0.70)	-0.0226* (-1.95)
<i>Indrate</i>	-0.0109 (-0.08)	-0.1651 (-1.27)	0.0904 (0.46)	-0.4087** (-2.17)
<i>con</i>	-0.0707 (-1.31)	-0.0626 (-1.15)	-0.1506* (-1.92)	-0.0340 (-0.46)
<i>Cc</i>	-0.0072 (-0.70)	-0.0119 (-1.25)	0.0278** (2.26)	-0.0622*** (-4.08)
<i>Constant</i>	0.0181 (0.07)	-1.1194*** (-4.20)	0.3677 (0.98)	0.3482 (1.02)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i>N</i>	1172	1172	502	670
Pseudo <i>R</i> ²	0.3463	0.3482	0.9953	0.5787
<i>F</i>	6.443	6.174	6.125	4.37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 值。

(四) 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隐形冠军”企业的专业化经营决策,本文按“隐形冠军”企业所在的地域进行分组回归。表 9 的第(1)和第(2)列汇报了东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的回归结果,第(3)和第(4)列汇报了中西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经济政策不确定型指数(*EPU*)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Divhhi*)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型指数(*EPU*)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Divhhi*)都发挥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的“隐形冠军”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型指数(*EPU*)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知识产权保护程度(*Divhhi*)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不论是对政策的敏感度还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都要高于西部地区。因此位于东部地区的“隐形冠军”企业更迅速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

表 9 按地域分组检验

<i>Ex_s</i>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i>Divhhi</i>	0.0755*** (3.38)	0.0318*** (4.10)	0.0724** (2.31)	0.0482*** (2.83)
<i>EPU</i>	0.0450 (1.21)		0.0787 (1.41)	
<i>Divhhi</i> × <i>EPU</i>	-0.0012* (-1.75)		-0.0016 (-1.56)	
<i>IPR</i>		-0.0488*** (-9.24)		0.0876* (1.95)
<i>Divhhi</i> × <i>IPR</i>		-0.0119*** (-2.83)		0.0729* (1.67)
<i>Age</i>	0.0649* (1.69)	0.0746** (2.13)	0.0748* (1.80)	-0.0469 (-1.21)
<i>Size</i>	0.0114 (0.95)	0.0020 (0.16)	-0.0282** (-2.03)	-0.0497*** (-3.58)
<i>Loan</i>	-0.0473 (-0.69)	0.0242 (0.34)	0.1282*** (3.05)	0.1609*** (4.79)
<i>HHI</i>	0.3051 (0.68)	0.4053* (1.82)	-0.0096 (-0.03)	0.2142 (1.14)
<i>Subsidies</i>	-4.2255*** (-5.40)	-3.9523*** (-4.67)	-0.8582 (-1.62)	-1.6889*** (-3.28)
<i>Roa</i>	-0.4156** (-2.01)	-0.4761** (-2.25)	-0.1059 (-0.60)	-0.1523 (-0.81)
<i>Leverage</i>	-0.0213 (-0.35)	-0.1691*** (-2.76)	-0.0384 (-0.59)	-0.0674 (-1.11)
<i>Gsales</i>	-0.0240*** (-2.75)	-0.0034 (-0.36)	0.0011 (0.12)	-0.0003 (-0.03)
<i>Indrate</i>	-0.2509* (-1.80)	-0.1044 (-0.71)	-0.2690* (-1.66)	-0.3202* (-1.81)
<i>con</i>	0.1161* (1.66)	0.1379** (2.03)	-0.4356*** (-7.31)	-0.4105*** (-6.78)
<i>Cc</i>	-0.0166 (-1.43)	-0.0096 (-0.85)	-0.0306*** (-2.84)	0.0049 (0.52)
<i>Constant</i>	0.4520 (1.43)	0.2229 (0.75)	1.2356*** (4.00)	1.3827*** (4.84)

续表

<i>Ex_s</i>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i>OwnshipD</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D</i>	Yes	Yes	Yes	Yes
<i>YearD</i>	Yes	Yes	Yes	Yes
<i>N</i>	770	770	402	402
<i>Adj-R²</i>	0.3318	0.1231	0.4133	0.1774
<i>F</i>	16.443	9.003	18.421	4.483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隐形冠军”企业数据,检验了“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并具体考察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其出口绩效的提升;②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的调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降低“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提升“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与出口绩效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隐形冠军”企业所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小;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东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的负向调节作用更显著,且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东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对中西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试图给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资源分散无法造就世界级的公司,只有坚持不懈的专注才能成就冠军。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只能坚定的进行转型升级,回归主业,回归专业化,从粗放式扩张转向精约发展,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壮大,从而促进我国产业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此,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亟需加强资源积累,聚焦一个行业,专注一个产品,执着一种市场,做好一项服务,持续改善和培育企业的生态价值链,建立以技术、质量、品牌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真正成就世界级的“隐形冠军”企业。对于政府,首先应当持续不断地优化国内市场制度环境,加强外部政策方面的稳定性,降低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外部环境发展的不确定性。其次,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切实落实十九大精神“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随着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我国中西部地区“隐形冠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日益上升。加强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为该地区的“隐形冠军”企业营造利于创新创造的营商环境,降低其专业化经营的风险,促进“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培育一批世界级的“隐形冠军”企业集群。

参考文献

- [1] 陈战光,李广威,梁田,等,2020.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J].科技进步与对策,37(10):108-117.
- [2] 戴其文,魏也华,宁越敏,2015.欠发达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35(2):14-21.
- [3] 赫尔曼·西蒙,2017.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M].张帆,吴君,刘惠宇,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4] 赫尔曼·西蒙,2019.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第2版)[M].张帆,吴君,刘惠宇,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5] 黄利潮,张毕西,2007.“隐形冠军”企业成功因素研究[J].商场现代化(12):90.
- [6] 黄先海,卿陶,2020.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J].财贸经济(4):99-114.
- [7] 江书陆,2005.“隐形冠军”的市场垄断及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启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8(2):20-23.
- [8] 蓝海林,2008.建立“世界级企业”:优势、路径与战略选择[J].管理学报,5(1):9-13.
- [9] 李莉,闫斌,顾春霞,2014.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不对称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J].管理世界(11):1-9.
- [10] 李庆华,李春生,2008.“隐形冠军企业”研究:战略逻辑、经营模式与关键成功要素[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0(6):42-47.

- [11] 李雪灵, 张惺, 刘钊, 等, 2012. 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11): 86-98.
- [12] 李政, 朱明皓, 温博慧, 20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理[J]. 财贸经济, 42(1): 92-106.
- [13] 廖开容, 陈爽英, 2011. 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9): 1342-1348.
- [14] 刘伟, 杨贝贝, 刘严严, 2014. 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32(3): 421-430.
- [15] 任颀, 茹璟, 尹潇霖, 2015. 所有制性质、制度环境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选择[J]. 南开管理评论(2): 51-63.
- [16] 邵传林, 邵姝静, 2016. 制度环境, 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资: 一个文献综述[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18(3): 110-116.
- [17] 邵丽丽, 孙铮, 2017. 风险对冲手段、汇率冲击程度与风险管理效果——来自上市公司出口业务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7): 41-47.
- [18] 谢军, 徐青, 2009. 产品多元化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实证研究——对广东浙江两地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10): 40-45.
- [19] 许惠龙, 康荣平, 2003. 隐形冠军: 全球最优秀的公司[J]. 管理世界(7): 150-152.
- [20] 汪洋, 许宏杰, 2014. 基于隐形冠军角度的创业企业战略选择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8): 88-95.
- [21] 吴超鹏, 2009.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 来自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理论与实证证据[D].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 [22] 杨兴全, 李文聪, 尹兴强, 2019.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J]. 财经研究(8): 58-71.
- [23] 杨震宁, 范黎波, 李东红, 2014. 是“腾笼换鸟”还是做“隐形冠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多案例研究[J]. 经济管理(11): 68-80.
- [24] 易靖韬, 蔡菲莹, 2019. 企业创新与贸易方式转型: 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自由化的调节作用[J]. 中国软科学(11): 119-128.
- [25] 张梦丹, 魏景赋, 2017. 出口地理多样化与中国制造业行业绩效——基于出口强度视角[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5): 68-73.
- [26] 张天顶, 吕金秋, 2018. 企业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变化与中国企业出口[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5): 49-58.
- [27] 赵军, 姚笛, 郑玉璐, 2020. 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与制造业出口质量[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197(6): 22-36.
- [28] 周建, 方刚, 刘小元, 2010. 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企业竞争优势——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学报, 7(7): 963-971.
- [29] 周黎安, 罗凯, 2005. 企业规模与创新: 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季刊)(2): 623-638.
- [30] 朱利江, 2015. 隐形冠军企业成功经验实证研究[D].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
- [31] 朱巍, 陈慧慧, 陈潇宇, 2019. 隐形冠军: 国际竞争视野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变革趋势与策略[J]. 科技进步与对策, 36(3): 83-88.
- [32]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2016.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4): 1593-1636.
- [33] COLLIS D J A, 1991. Resource-based analysis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he bearings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2): 49-68.
- [34] FAHY J A, 2002. Resource-based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 global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11): 57-78.
- [35] GOKALP O N, LEE S, PENG M W, 2017.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evasion: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2(2): 258-269.
- [36] HIRSHLEIFER D, LOW A, TEOH S H, 2012. Are overconfident CEOs better innovator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4): 1457-1498.
- [37] KAFOUROS M, WANG C, PIPEROPOULOS P, et al, 2015.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region-specific institutions[J]. Research Policy, 44(3): 803-817.
- [38] KUNST R M, MARTIN D, 1989. On export and productivity: A causal analysi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4): 699-703.
- [39] MEYER K E, PENG M W, 2015.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merging economy business resear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1): 322.
- [40] NORTH D C, 1991.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 97-112.
- [41] PENG M W, 2002.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23): 251-267.
- [42] PENG M W, WANG D Y L, JIANG Y, 2008.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5): 920-936.
- [43] PFEFFER J, SALANCIK G R,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J]. The

Economic Journal, 89(356): 969-970.

- [44] SCHOAR A, 2002. Effects of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on productivit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7(6): 2379-2403.
- [45] SCOTT J T, 1995. The economics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ynamics[J]. Empirica, 22(3): 245-249.
- [46] WILLIAMSON, O 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3): 595-613.
- [47] ZHAO M, 2006. Conducting R&D in countries with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52(8): 1185.

Speci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 Enterprises Moderating Rol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iu Zeyan, Lin Hanchuan, Huang Guanhua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important growth strategies for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Based on resource theory, by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of hidden champion from 2010 to 2018, the impact of specialization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is analyzed. Based on institutional-based view,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peci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change with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low,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enhance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ization on export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ith high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reduc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specialization on its export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An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On this basic,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crease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dden champion companies.

Keywords: hidden champion; specialization; export perform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